昆明学院学报　2018，40（5）：90～95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边疆治理研究】

影响中越陆地划界的国际因素浅析（1950年—2009年）

崔瀚鹏，王振刚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1950年至2009年，中越陆地边界的划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间，虽然中越两国的政治关系和各自的边界认知是影响边界划定的直接因素，但国际因素也对中越陆地边界的划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实际上，国际因素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内对中越边界局势的左右超过了两国政治友谊的影响，其中超级大国的远东政策是影响中越边界问题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中越边界；陆地边界；边界划定；国际因素；边界问题
中图分类号：D815.3；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8）05－0090－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8.05.016

International Factors about Influencing the Demarcation of the Land Boundary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1950—2009）

CUI Hanpeng，WANG Zheng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China　650091）

Abstract：From 1950 to 2009，it is a long period of time for the demarcation of the land boundary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Besides political factor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international factors also produce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for the demarcation. In fact，international factors influences more than that of the political friend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som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of time and the policies of the Far East from the super nations are the fundament factors for the trend of the demarcation.

Key words：the land boundary of China and Vietnam；the land boundary；delimitation of boundaries；international factors；boundary problems

2009年2月23日，1116号和1117号界碑的揭幕，标志着为期10年的中越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的全面完成，也是中越①双方自1999年12月30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以来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历史上，中越陆地边界问题十分复杂，中越两国对边界的确定亦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在中越边界的研究上，中国学术界多是以中国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探析，极少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对影响中越陆地划界的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在世界呈多极化发展的今天，国家边界交涉中除了当事国双边因素外，国际多边因素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就中越边界问题而言，对两国划界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国际因素进行分析，不仅能够立体地呈现中越陆地划界的经过，而且对当代中国解决边界问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18－06－08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2018年度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学科（群）特区高端科研成果培育项目“地缘政治视阈下中国与周边国家陆地划界问题研究”（G2018－07）。
作者简介：崔瀚鹏（1989—），男，河南许昌人，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王振刚（1978—），男，河北大名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南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边疆史研究。

①1945年至1975年，越南分为南北两个政权。本文如未加特别说明，“越南”一词在表述1975年之前的政权时专指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表述统一后的越南时即指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

1950 年 1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予以承认，成为首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1975 年之前，中越两国政府保持着“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关于中越陆地边界问题，1957 年至 1958 年间，两党换文中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两国政府应遵循中法界约划定的中越陆地边界线，以当下实际管辖范围为基础，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中越两国在陆地边界问题上作出该项决议，是与当时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分不开的。

对中国而言，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生的政权，与苏联、蒙古、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结成同盟，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展开对抗。1950 年至 1954 年，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甚嚣尘上，受其影响，美国对中国等新生的共产党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先后成立日美韩台联盟、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等国际组织，对中国进行政治围堵和经济封锁。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入朝鲜战事，企图以朝鲜半岛为基础，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国家安全，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遏制政策，而对于晚清、民国时期所遗留的与周边国家的划界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不承认主义”和“暂时维持现状”的办法[1]。然而，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该项办法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1]，随着形势的发展是要发生改变的。1955 年 11 月，中缅黄果园边界发生冲突事件，使中共中央认识到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应逐渐提上日程。1956 年至 1960 年，中缅两国政府通过对话、磋商，于 1960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签订了新的中缅边界条约。中缅边界的划定成为中国与周边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此后，中国先后同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签订了边界条约①，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得到了顺利解决。

中缅边界的成功划定为中越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然而，由于战争和国际政治博弈的影响，中越陆地边界的划定受到阻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者重返东南亚，妄图恢复其殖民统治。1954 年，越南取得抗法斗争的胜利。同年 7 月的日内瓦会议中，法国被迫承认越南独立，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瓦解。然而，此时的越南分为南北两个政权，国家未实现统一。1955 年，南越成立“越南共和国”，获得美国的支持，为南北越统一增加了阻力。1961 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直接参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行动，美、越之间遂展开了长达 12 年的战争。1973 年，受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和国内反战舆论的影响，美国与越南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同年 3 月撤兵。1976 年，越南南北宣布统一。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 1945 年至 1975 年，越南一直处于战争动荡和政治分裂之中，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是越共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越南一方面并无过多的精力关注中越边界问题，一方面在抵抗侵略的过程中又严重依赖中国援助。而中国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需要稳定的边界环境来保障国内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在边界问题上，双方均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

二

1975 年至 1991 年，是中越两国因边界问题（包括海上划界问题）而关系恶化的时期。从 1975 年开始，中越边界问题集中爆发，并随着南北越统一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有愈演愈烈之势。边界争端使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友谊不再，两国国家关系也由友好转为对立。这种状况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除了越南在边界政策上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外，国际上大国政治博弈是两国关系变化的关键因素。首先，越南的边界政策的矛盾性决定了中越划界的曲折性。越共在对待中越陆地边界划分问题的认知上，虽然有 1957、1958 年的两党换文作为尊重 1887 年《中法界约》中边界相关规定的依据，但是，认为

①其中，1963 年 3 月 2 日，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北京签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

中国“侵占”越南领土的意见一直没有消弭。1945 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即对中方所持的中越陆地边界已勘定的立场表示异议，认为“当时清朝政府向法国‘施加压力’，使法国把越南一些地方‘割让给清朝’，‘使越南人民受到损失’”[2]，中越之间 1347 km 的边界线是“帝国主义强加给越南政府和越南人民的”，“使越南丧失了大片的国家领土”[3]338－339，要求中越需重新划定边界。然而当时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刚刚成立，尚无力处理边界问题。1945 年 9 月抗法战争爆发，越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边界问题暂且搁置，并一直持续到 1975 年。

其次，冷战时期的大国博弈也对中越国家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波及两国边界的划定。1954 年，旨在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达成了印支地区的和平协议，法国的殖民统治遭到失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越南取得奠边府大捷，遂谋求南北越的统一和东南亚问题的通盘解决。为避免美国干预，中国基于两大阵营对抗因素，“主张划界停战，保住现有成果，凭借越南党和胡志明的威望完全可以通过普选实现和平统一”[4]，即建议南北越以北纬 17 度线划线而治。越南虽对中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5]的长期斗争策略表示同意，但中越两党关系却产生了裂痕，越共中央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害怕卷入战争，直接与美国对抗”①[5]。20 世纪 60 年代，越南又卷入了抗美战争，十分依赖中国援助，在此背景下，越共未将两国矛盾表面化。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苏联对越南较少关注。1960 年后，苏中关系恶化，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展开大论战。中苏论战时期，越南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对于促成中苏和谈有积极作用。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中方对越南的调解态度开始不满，1963 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公开点名批评越南说：“……胡志明动动摇摇，这位同志历来右倾……这次中苏两党论战，越南是既转播我们的，也转播苏联的。”②[6]此后，中国在援越方面开始注入排苏因素，引起越南的不满。但是，此时的苏联为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在对越援助上采取“脱手”政策，这使得越南在对战略物资的获取上依然严重依赖中国。1964 年，苏联开始加强对越南的重视。从 1965 年开始，苏联对越援助突然增加，这使得越南在政治上逐渐偏离中国。同时，中国对苏联过境运向越南的物资进行掣肘，激起了北越的反对[4]，在政治上与中国愈行愈远。1969 年胡志明逝世，为越南与苏联结盟铺平了道路[7]，加速了越南向苏联倾斜。该世纪 70 年代以后，中国与美国国家关系的改善，被越南人斥为中国出卖越南的新证据。[6]

中越两国的矛盾在 1975 年集中显现出来。随着南北越统一的完成，在苏联全球霸权主义战略的影响下，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也极度膨胀③。为实现其建立印度支那联邦构想，越南不惜破坏中越友谊，挑起边界争端，企图阻止中国对其在东南亚霸权主义的干涉。1975 年至 1978 年间，中越陆地边界冲突从每年的 100 多次增至每年 1000 多次④[8]194。1974 至 1979 年，越南在中国边境制造挑衅事件共3535 起，其中，“一九七四年一百二十一起；一九七五年四百三十九起；一九七六年九百八十六起；一九七七年七百五十二起；一九七八年一千一百零八起；一九七九年（到二月十六日）一百二十九起”[2]。

越南在中国边界地区的不断挑衅，是与苏联的支持分不开的。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苏联奉行全球霸权扩张政策，在冷战中处于攻势，美国则趋于守势。而越南一直所想达成的地区霸权与苏联全球霸权主义互为表里，成为苏联在东南亚扩张势力的

①1979 年越南发布的《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第 9 页，28 页。见文后参考文献［5］。

②《刘少奇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1963 年 2 月 25 日）。见文后参考文献［6］。

③越南的地区霸权的思想，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时就开始略显，当时越南即主张印度支那问题通盘解决，建立印度支那联邦。为取得中国的帮助，越南将柬埔寨、老挝两国是人民承认的合法政府的情况对中国做了隐瞒。虽然当时越南的目的没有达成，但从此后越南与东南亚诸国关系来看，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越南彻底倒向苏联后其地区霸权主义逐渐付诸实施，便可知晓越南自日内瓦会议后一直没有放弃其称霸东南亚的想法。

④《评越南当局拒绝谈判》，《人民日报》社论，1979 年 2 月 27 日。见文后参考文献［8］。

助力。因此，苏联给予越南以极大的援助，这种援助不仅体现在物资上，而且加深了两国在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合作。1978 年 11 月，苏、越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在苏联的庇护下更有恃无恐。在苏联的默许下，1978 年 12 月 25 日，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侵略战争，此举严重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中方的强烈谴责。同时，越南政府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警告，“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任意开枪开炮，毁我村寨，杀我军民，抢我财务，袭我火车，酿成严重流血事件”①[3]346。1979 年 2 月 17 日至 3 月 16 日，中国政府被迫发起了一场有限度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

另一方面，中国的周边不稳定因素也是越南实现大国沙文主义、挑起边界冲突的诱因之一。就中国而言，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所涉及的每一场对外武装冲突均与边界有关。虽然中国在历次战争中均获得胜利，但是相关边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从而为中国的边界安全埋下了隐患。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 1969 年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北部和西部的边界地区安定不再。进入此世纪 70 年代，中国北有苏联，东有美国，西有印度，仅南方的陆地边疆尚相对安全（海上有美国为包围中国而设计的“岛链”）。倘若越南在边界上向中国发起挑战，不仅可以使中国陷入周边“合围”之中，而且与苏联遥相呼应，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可“利用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的支持牵制中国来实现自己的地区霸权主义”[3]339。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越南的失败，迫使越南政府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但是越南“一直拒绝承担反对谋求霸权的义务，拒绝承担不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驻在外国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的义务”，“甚至在实际行动上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不遵守”[3]352。然而，越南所奉行的地区霸权和扩张政策是“产生中越领土问题的根源”[9]。1979 年至 198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霸权主义达到高潮。在此国际背景下，越南坚持亲苏外交方针，继续推行侵略政策，中越双方围绕陆、海疆大小武装冲突不断，边界谈判毫无进展。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苏东政治动荡，苏联陷入分裂危机，无暇再兼顾越南，越南的霸权政策受到打击，开始谋求与中国和解。1989 年 10 月，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委托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向邓小平表达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邓小平对此表示欢迎。但是直到 1991 年苏联解体前夕，中越关系有了真正转机之后，两国陆地边界谈判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三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冷战格局开始出现瓦解的迹象，这对中越关系的改善和中越陆地边界的划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苏联方面，长期与美国争霸和阿富汗战争导致的国力耗损，激化了苏联的国内矛盾，从而走向解体。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在阿富汗的形势每况愈下，同时，国际社会对苏联的侵略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在军事、政治双重压力下，苏联被迫同意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标志着其全球霸权战略的失败。1985 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推行改革。但是，其倡导无保留的“自由”和“民主”的改革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离心的理论基础。1987 年，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加盟共和国爆发群众示威游行，拉开脱苏序幕。1989 年三国民族分离主义者开展民族独立活动。1990 年，立陶宛率先通过国家独立法，改名立陶宛共和国，宣布脱离苏联独立。立陶宛的独立引发了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1990 年至 1991 年 12 月 25 日前，共有 15 个加盟共和国脱离苏维埃联盟。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正式解体。与此同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丧失政权，国家根本制度由社会主义变更为资本主义。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国际共运陷入低潮。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苏联自顾不暇，无力切实履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中对越的全部义务。越南失去苏联支持后，其“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遭到东南亚各国反对，侵

①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

略行径暴露无遗。20 世纪 80 年代末，越南为了改变四面受敌的现状，开始考虑与中国和解。1989 年，越南同意当年全部撤出侵入柬埔寨的军队，中越关系开始出现好转。1990 年，中越实现“成都会晤”。1991 年，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越南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期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和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武宽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这不仅是对 1957 年、1958 年间的两党换文相关内容进行再度声明，而且是“中越两国政府之间关于解决双边陆地边界问题的外交谈判”[3]472 正式恢复。

中国方面，改革开放的施行，使中国的经济逐渐走出计划经济的窠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活力。20 世纪 80 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僵化，致使社会经济长期低迷，政治上官僚作风严重，极大地滞碍了国家正常的发展。苏东各国社会经济状况和中国相比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摆脱联合国制裁，改变空前孤立的国际环境，1986 年越南开始学习中国，进行“革新开放”。越南的社会经济改革标志着其在经济上开始趋向中国，为此后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埋下伏笔。

美、中国家关系方面，虽然 1979 年与中国建交，然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并没有完全消弭。在国家关系上，两国关系呈现出在斗争中求发展的态势。1989 年，美国借口中国国内政治风波，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从 1989 年至 1992 年，美国与中国断绝公开的对话往来。1996 年，台海危机爆发，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1999 年，美国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在此一系列事件中，中国并没有陷入被动局面，反而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展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历次挫败美国反华行动中，中国表达了国家崛起不可阻挡的信念。

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和日益强大的国力，加快了中越陆地边界谈判的速度。1992 年 10 月至 1993 年 2 月，中越双方开启“专家级”外交谈判；1993 年 8 月 24 日，谈判规格升级为“政府级”，开启第三次副部长级外交谈判。1993 年 10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在越南河内正式签署《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以下称《基本原则协议》），“为两国最终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10]。1994 年以后，中越两国根据《基本原则协议》的相关规定，双方成立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具体负责边界勘察事务。至 1995 年 5 月，联合工作组举行五轮会谈，取得一定进展。经多次协商后，1997 年两国达成共识，计划于 2000 年签署两国陆地边界条约，中国也本着“大局为重、求同存异、先易后难、只争朝夕、友好协商、公平解决”[11] 的精神加快了谈判进程。1999 年 2 月，中越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定在 1999 年内签署陆地边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下称《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终于在 1999 年 12 月 30 日签署完成。《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具体叙述了中越陆地边界的全线走向，在 1347 km 的边界线上划分 62 个界点，每一处界点都有详细的标注。《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签署完成，标志着中越两国陆地边界存在的问题已全部解决。

进入 21 世纪，世界格局有了新的变化。“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冷战后威胁世界安全的新因素开始被广泛关注。美国作为恐怖袭击的受害国，直接主导并参与了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的行动。然而，在反恐军事活动中，由于国力的下降，美国独木难支，国际合作成为世界反恐行动的主要形式。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的过程中，中国由于长期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的国策逐渐被各国认可，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不断上升。中国国力增强和经济繁荣，带动了周边各国的发展。越南自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革新开放国策以来，以华为师，结合国家实际情况，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在边界问题上，基于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两国关于签署勘界议定书的意愿也更加明确。2000 年 4 月和 7 月，根据 1999 年签署的《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第八条规定，中越双方政府分别通过了批准该条约的决议。2000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1 月，是中越两国边界的" 勘定" 时期，本着对等原则，中越双方在陆地边界地区进行了为期 9 年的实地勘察及树立界桩的工作。2009 年 11 月 18 日，中越两国在北京正

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勘界议定书》（以下简称《中越陆地边界勘界议定书》），至此，中越两国陆地边界全线勘定。

四、结语

中越陆地边界的划定，以 1957 年两党换文达成共识至 2009 年勘界议定书签署为止，整整经历了 52 年。在此期间，虽然中越两国的政治关系和各自的边界认知是影响边界划定的直接因素，但是国际间的风云变幻也给两国边界划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国际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对中越边界局势的左右超过了两国政治友谊的影响。据统计，1950 年至 1975 年间，中国派出援越部队 32 万余人，专家顾问 2 万多人，援助金额达 200 亿美元，多是无偿援助或无息贷款形式。在援助过程中，中方人员伤 5000 人，亡 1100 人[8]189，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在苏联的政治诱惑下，越南逐渐离华靠苏。越南国家统一后，为配合苏联全球霸权主义，公然通过反华宣传、军事入侵等方式在中国边境制造事端。自此，中越两国陆地边界和平友好不再。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越关系趋于缓和；90 年代，中越边界谈判才有了实质性进展。

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远东政策是影响中越边界问题发展走向的重要国际因素。冷战时期，美国对亚太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策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此时，中越两国国家关系良好，边界环境也相对安定。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中美关系正常化被越南指为中国背信弃义的实证，并成为越南侵略中国边界的借口①。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形成。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对华除和平发展外依然保留遏制政策。然而，中国国力的提高和美国历次挑衅的失败，使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这也深刻影响了中越边界谈判进程。中越两国在 20 世纪最后一个月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并在 2009 年通过《中越陆地边界勘界议定书》，使两国陆地边界线最终划定。

目前，中国有 14 个陆上邻国，累计边界线超过 2 万千米．中国也是世界上陆上邻国最多、陆地边界最长、边界问题最复杂的国家之一。随着世界多极化发展，国家间双边事务的处理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就目前中国边界而言，陆地方面中印边界及受印度影响的中不边界尚未确定，海疆更面临与南海、东海等海上邻国的划界以及领土争端。因此，以中越陆地边界问题为鉴，重视国际因素在边界划定中的影响，对解决当今中国存在的边界争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植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4.

［2］中越边界问题的真相［N］．人民日报，1979－05－14（1）.

［3］齐鹏飞．大国疆域——当代中国陆地边界问题述论［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4］饶小琴．试析 20 世纪 70 年代中越关系巨变之苏联因素［J］．西伯利亚研究，2011（5）：79－84.

［5］王淑会．1960 年国际共运中的中越关系［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6］肖国龙．中美关系解冻时期的中国对越政策研究（1968—1972）［D］．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4.

［7］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229.

［8］聂宏毅．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 60 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9］我代表团长在中越谈判第四次会议上揭露越方无理纠缠使谈判仍无进展［N］．人民日报，1979－05－13（1）.

［10］唐家璇．劲雨熙风［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42.

［11］钱其琛与越南外长会谈［N］．人民日报，1997－07－16（1）.

①中美关系正常化，为越南提供了反对“中国霸权主义”“保卫国家领土”而侵占中国边界的借口，从此无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印支半岛推行地区霸权主义。